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

著等光海殷 三八之書叢學文記傳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

傳記文學叢書之八三（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

定價

著者：殷海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給中國讀者的幾句話

本人準備訪問臺灣之行，實現了心中長久懷抱的願望。

中國的文明和中國的藝術久為本人特別愛賞和欽慕。本人實地目睹此一文明和藝術，由此所得到的滿足將給予本人以最大的快樂。

同時，本人極其期待與舊日友人及學生重行把晤，並討論有關自由社會的未來之諸重大問題。

海耶克於德國佛萊堡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給中國讀者的幾句話

一

Professor Dr. F. A. v. Hayek
Volkswirtschaftliches Seminar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78 Freiburg i. Br., den
Wethmannsplatz 1
Telefon 31 52 (Universität) Apparate 2123

The prospect of a visit to Taiwan promises the fulfillment of a long held wish.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art have ever been to me the object of a peculiar fascination and admiration.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wish to see them on the spot will give me the greatest pleasure. I am also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again many old friends and former pupils, and to discuss with them the grave problems of the future of a free society.

Freiburg i. Br., 30th May 1965

F. A. v. Hayek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

海耶克論自由的創造力（代序）

殷海光

——從「無知論」出發

—

自來即令是最藐視是非和真理的人物，爲了取得現實的利益，也常以極肯定的態度來壟斷是非和斬喪真理。這類人物常常毫不遲疑地表示：「真理就在我的手裡」。可是，說來似乎有點諷刺，海耶克 (F. A. Hayek) 在論「自由的創造力」時，他據之以出發的知識學的基礎是「無知論 (Theory of Ignorance)」，他藉無知論來提醒世人，自己所知道的是怎樣的少。我們的知識領域愈是開拓了，我們對於自己之無知的發現愈多，既然如此，於是我們所保有的知識不足以

代序

—

作過多的預測，也不足以負擔全盤計劃。由此可以推論，一切全盤計劃都是愚妄。我們要達到一個美好的社會，可行的途徑就是發揮個人的自由創造力。

海耶克所說的「無知論」，向往古看可以追溯到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向現代看則是和科學的哲學家波柏爾（K. R. Popper）分享。蘇格拉底說：「你也許還要辯稱，無知可以使人有知，盲目可以使人看見，而且知識能够使人無知。」（*The Dialogues of Plato, Theaetetus*, 199）

波柏爾說：「我告訴我的朋友，我希望藉着這次講演的標題引起大家注意一些雖然沒有記載下來但是在歷史上却關重要的哲學論旨。在這些論旨之中，尤其重要的是「無知的詭謀論」。這一論說不只是把無知解釋作缺少知識而已，並且認為無知是由某種毒惡的權力造成的。這種無知乃邪辟的影響之源。這些影響敗壞我們的心靈，毒害我們的心靈，並且徐徐造成我們一種習慣，使我們抗拒知識。」（Karl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P. 3, 1962）「抗拒知識」

自古已然。一切形態的極權統治和真知真識不能兩立。真知真識的光一照，一切黑暗立即消失不見。所以它要想盡方法抗拒知識。秦始皇「焚書坑儒」算是開其先河。但是，現代極權統治之抗拒知識的技術比秦始皇進步。現代極權統治刻意洗掉一切客觀的知識，而換上依其政治需要來織成的一套知識。這一套知識乍看起來似乎也言之成理，真實根本經不起分析的批評。真正無知還不太嚴重。抗拒知識才是絕症。無知的人總不知道自己無知。人間許多不必要的禍亂常由此造成。

二

從「無知論」出發，海耶克論列自由的創造力。他說我們認識吾人之「無知」，乃智慧之起源。尤其當我們被現實層界的權勢填進五顏六色的似真知識（*Pseudo-Knowledge*）時，受害遠甚於無知。處於這種情形之中，我們應須自視爲可憐的病例。爲着心靈的康復，我們亟需求治於醫師。而「歡迎知識」，是救治的先決條件。

在正常情形之中，我們的知識是從我們置身於其中的文明裡得來的。可是，據海耶克說，人類的知識是很不完備的，我們對於社會的知識尤其不完備。古往今來，有許多思想家常對社會的遠景作烏托邦式的構想。這類構想者往往以爲他們的構想是建立於對社會之完備而堅實的知識上面。殊不知這樣的知識迄未獲致。所以，這類構想很少不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因此，海耶克說這類構想是沒有價值的。

這類構想儘管沒有價值，但不能阻止人衆跑去接受。當着一個構想沒有完備而又堅實的知識基礎但却能勾起人的幻想時，或者能够使人發生望梅止渴的作用時，就無法不使它發生推動行爲的力量，在這種情形之中，社會也許就面臨一個大變動的前夜。這樣釀成的大變動，也許就是一個風暴式的大災害。波柏爾說：「偉大的人物可能造成偉大的錯誤。」（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eface, 1950) 細小人物常只能造出細小的錯誤，可是古往今來，有許多所謂「先知先覺」，有許多所謂「偉大人物」，常常造出偉大的錯誤。如果馬克思是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那末他也是十九世紀偉大錯誤的思想家。他曾預言，透過社會主義之路，國邦將會萎謝；可是一個強大的沙文國邦却在社會主義中出現。他曾預言資本制度必然崩潰。今天，資本制度不僅沒有崩潰，而且社會主義的先進國邦向資本主義的國邦購買小麥，並在李伯曼主義的面貌之下逐漸走向資本制度。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十九世紀的先知預言都錯了。可是，爲了他的錯誤而殉葬的人可就多了。他的錯誤有助於帶來今日一個動亂不安的世界。推廣來說，我們的心靈如果够成熟，那末對於被捧作「先知先覺」和「偉大人物」的許多人大都可作如是觀。波柏爾沉痛地說：「如果我們的文明要能存續，那末我們就得打破崇拜偉大人物的習慣。」(Ibid.) 這真是慨乎言之！回顧人類歷史的過去，大災害常常是所謂「偉大人物」造出來的。如果人類還不打破盲目崇拜所謂大人物的習慣，而且不直接運用自己的觀察和思想來分辨事理，來審度利害，那末我們還要受害，我們的子子孫孫還要受害無窮。

爲什麼呢？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海耶克所說的「無知」……「人類所知愈多，則一個人所能吸收的部分愈少。……知識的劃分愈增，則個人所知愈少。」(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p. 26, 1960) 這是知識分殊之無可避免的結果。而作任何計劃同決定，知識是必不

可少的條件。所謂「包羅萬象的先知」已經是古物陳列館的遺物了。不過，真知真識的獲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知真識是冷靜而現實的產品。一個人或一群人必須有心靈的勇氣，才能「面對現實」。能「面對現實」的人，才可能得到真知真識。不巧的很，芸芸衆生之中，能「面對現實」的人竟是那麼少。大多數人是在無意之間作幻想的俘虜。不僅如此，我們對於人事界的知識遠不及對身外的自然界之知識精確可靠。但是，我們爲了處理人事，又非有對人事界的精確可靠的知识不可。既然如此，於是人間出現了一種極爲奇妙的現象。許多人常常拿神話當作真知灼見的代用品：製錶小事靠精確的科學知識；治國大事却靠不可捉摸的神話。愈是修路建屋的小事人衆愈可公開參加意見；愈是邦國大計愈是不容人衆置喙。大家有擦螺絲釘的自由，却沒有拿方向盤的自由。千千萬萬人「盲人瞎馬」一般跟着極少數頭腦走。這樣衆智拼息，社會豈有不陷危險之理？

三

海耶克說，關於社會的發展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從「部落社會」到亞當·斯密的「大社會」；第二種說法是從柏拉圖式的「封閉社會」到波柏爾所說「開放的社會」；第三種說法是從目的社會 (*telocentric society*) 到阿克夏 (Michael Oakeshott) 所說的「法治社會 (*nomo-*

代序

cratic society)」。部落社會在基本上是封閉社會，這種社會受酋長統治，禁忌和神話以及風俗習慣固定地支配着群體的生活與觀念，特定的目標成爲群體生活的指向。例如，大家共同爲着一個什麼神祇而努力，甚至犧牲一切。（參考海耶克十月八日在臺灣大學的講演）這種部落觀念，可以轉形而成對天皇的崇拜，以侵華爲舉國目標；也可能轉形爲對領袖阿道夫·希特勒（der Fuehrer Adolph Hitler）的效忠，以排猶及征服世界爲目標。這類社會的目標都賦予「神聖」的色彩。這一「神聖」色彩之哲學化，就變爲「完成歷史使命」。而歷史使命之完成，不能由社會中多元分子定奪，只能山居於神話中心領導地位的奇理斯馬（Charisma）人物定奪。（這是 W. Weber 所提出的。所謂奇理斯馬，簡單地說，意即有神奇力量的領導人物。）人衆如果有何人生目標，那末不是被嚴格納入一個單一的大目標之下，便是被抑壓以至隱沒不見。所謂「大社會」和「開放社會」的輪廓和結構不够具體及清楚。照海耶克說來，阿克夏所說「法治社會」最爲可取。所謂「法治」，這個名詞的意義混含。依他的解釋，所謂「法治」，同義於「正義之治」。行「正義之治」的社會沒有類似所謂「舉國一致」的單一目標，更不可能有極少數人趁勢將自己的目標強加於社會全體而變成一個社會的目標。在這樣的社會只有各個人的特殊目標。這樣的社會爲各個人的特殊目標之實現而創造機會。但是，這並不是說，法治的社會裡各個人的目標一定沒有「輻輳」之處。有的。例如，自由的民主國邦當外患臨頭時各

個成員起來禦侮。但是，這種國邦裡各個成員之起來禦侮是出於大家的自動需要。這和利用情勢來抓緊人衆營造權勢在來路和實質上是根本不同的。

四

上面所作的社會分析，和自由的創造力有什麼關係呢？

開放的和法治的社會在許許多多方面是一個普遍性的和有彈性的社會。這就使自由的創造力得以無限展開。創造力得以無限展開，才能有無限的前途。

一個普遍性的社會，是對其中一切成員提供權利均等機會。這樣的社會，並不特別有利於某一特殊人物或某一特殊集團，正猶之乎並不特別有害於某一特殊人物或某一特殊集團。這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法治間架以內，所有的個人或所有的團體都有公平自由競爭發展的可能；政司不能利用他的權勢來助使某一特殊個人或某一特殊集團作壓倒式的發展；政司也不能利用它的權勢來阻害某一特殊個人或某一特殊集團的自由發展。依此推論，在這樣的「正義之治」裡面，任何言論，任何思想，一概可以像日用百貨一樣，自由地陳列在自由市場，任人自由選擇。如果其中有的貨品欠佳，那末態度消極的人可以不睬，態度積極的人可以提出充足的理由來反駁。言論問題

代序

有而且只有用言論來對付。思想問題有而且只有用思想來解決。別的辦法一概是不相干的。亞力山大用劍「劈開」了哥地王的結子（Gordian knot），可是他並沒有「解開」這個結子。他很英勇，但是他英勇得做了一件毫不相干的事。

復次，在「正義之治」的社會，沒有任何一種言論和思想可以特別居於壟斷地位而受到特別的保護。當然，這並不是說，在這樣的社會一定沒有特別居於支配地位的言論和思想出現。可能有的。但那不是由於真理以外的權勢因素所造成的，而是言論和思想在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各種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競爭，就是在機會均等的情況之下，直接訴諸各人的觀察、判斷、分析等等能力。這是一切言論和思想之真理性的一種考驗。許多人總愛堅持己見，自以為所持言論和思想是絕對的真理。好的，如果他們真個有這樣可愛的自信，就讓他們接受這一考驗吧！如果一種言論和思想通不過這種公平考驗，而必須托庇在現實層界的權勢陰影之下才有門面，那末我們怎麼知道它是真理呢？

為什麼說一個開放的和法治的社會又是有彈性的社會呢？顯然得很，即令是感覺不靈的人也可以感覺得出，一個封閉的社會是一個極度僵硬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講理」成了嘲笑的資料。一切的一切，完全控制於韋伯（M. Weber）所說的「官辦制度」（Bureaucracy）。在這樣的社會裡，不僅外部行為必需依照「規定」辦理，連思想、言論、以至於觀念活動都得按照表格

程式行事。結果，表面是壯觀了，可是心靈却枯萎了。巴黎蠟人館裡的男女乍看起來栩栩如生，可是究竟不能結婚生子。一個開放的文明社會不是如此的。這樣的社會是富於彈性的：不僅行為富於彈性，思想也富於彈性，因此也就富於適應力。這樣的社會，在一方面固然採取自己的文化傳統的經驗知識，同時也不拒絕吸收外來文化的要件。它不泥守成規，更不會照着老遠的遺訓行事。它是一個繼續不斷更新自己的系統。這樣的社會沒有把任何人當做基督教所說的「全智全能的父上帝」，而是承認人衆自由努力創造的價值。海耶克說：「所謂自由意即不直接控制個人的努力。一個自由社會所能利用的知識，遠較最聰明的統治者所能想像的為多。」我們之所以嚮往自由的社會是因為在自由的社會裡各人有機會大展長才，而無需順別人之意，看別人的顏色，甚至跟着別人一樣的錯以求存。

復次，一個自由的社會不輕易誇言舉國規模的建設，而只實事求是從事「片斷的社會工程」（K.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所以常呈現「社會彈性」。有彈性的社會，許許多多事都保有餘地，所以容易發展和進步。海耶克說：「如果我們要能進步，那末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思想中留有餘地，以便不斷修正我們現有的想法和理念。」（Hayek, p. 23）又說「自由之所以重要，係因它能為不可知的事及不可預料的事預留地步。」（Ibid. p. 29）面對活動繁雜的今日社會，我們到那裡去找無所不知的拉普勒斯的精靈（Laplacean demon）呢？動輒

以「規定」施諸人者，就是給人帶上枷鎖。帶上枷鎖的人，他本來具備的能量只能發揮十分之一二而已。這還能有什麼創造？一個人或一群人唯有能繼續不斷地自由創造，人生才有不斷開拓的遠景。

五

意圖「控制」人衆者，實在是自縛縛人。蘇俄的統治可算是一個典型的實例。蘇俄實行統制經濟，事事須由「中央管制」。這樣一來，權力欲和支配欲是得到高度的滿足；可是，却窒息了經濟的正常發展，以致生產低落。這是「教條經濟」的結果。這種經濟實行了四十年，事實告訴蘇俄統治者「此路不通」，於是他們不能不逐漸修正自己，徐徐解除「中央化」：藉着前述李柏曼主義而實質地向着他們所要消滅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習。老資格的蘇俄尙且如此，何況其他跟樣學的統治？

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只是例證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破產」而已，它可以看作是一切「統治主義（Controlism）」從根動搖的徵兆。如果經濟控制是一切控制的「物質基礎」，那末經濟控制既逐漸失靈，於是在一長遠過程中其他種類的控制無法不逐漸跟着鬆弛，以致於稀薄下去的。我們現在要問：在許許多層次的控制之中，蘇俄為什麼在經濟上先解除「中央化」

呢？因為，在一切層次的統治之中，經濟層次的統治之利弊得失最兌現、最明顯、最容易跟外界比較、因而也最不容易抵賴。蘇俄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經濟」四十年的成績，顯然不及「資本主義經濟」，國力顯然不及頭號「資本主義國邦」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顯然不及「資本主義社會」。何以弄成這種結果呢？如果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基本的原因是在自由制度之下富於創造動力，而在極權制度之下創造動力僵凍了。兩相對照，事實擺在大家眼前，強倔自信的蘇俄統治者也不能不低頭，向着經濟的解除統治主義 (economic de-controlism) 的道路走去。向着經濟的解除統治主義的道路走去，在事實上就是向着自由經濟走了。

經濟上的解除統治而向着自由經濟的道路走去，這一趨勢所帶來的概念，可以擴大到觀念、思想、和言論層次。由此延伸，又可能擴大到政治層次。如果擴大到了政治層次，那末就是接近自由建構的全部實現。也許，在這一發展的過程中，尚有許多艱難的曲折，但是水是往下流的。長江的水，經過千迴百折，終於奔赴大海。縱眼曠觀人類的歷史，可知一切拗逆衆好以成就少數人之私的建制，終會煙消雲散。蘇俄的這一變化，足可以教訓一切師法蘇俄制度而熱中於「統治主義」的人物。人類的坦蕩道途是自由。在自由的制度之中，各個人才能充分發揮創造力。各個人能充分發揮創造力，文化才可能有多彩多姿的發展。

(選自「時與潮」復刊一九八期，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臺北出版)

代序

目 錄

自由的倫理基礎.....	殷海光.....
海耶克教授經濟思想的結構.....	夏道平.....六一
海耶克教授.....	林毓生.....一一九
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胡適.....一四九
反奴役之路.....	蔣勻田.....一五七
海耶克論個體主義.....	勞思光.....一七一
經濟的自由主義.....	高壽昌.....一九九
介紹海耶克博士給中國知識羣衆.....	周德偉.....二一五